

「共產黨員」：個人情感中的政治符號

● 豐 簫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共產黨革命鬥爭方式和建設的組織技術、社會網絡、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得到學術界普遍的重視，近年許多學者開始注意情感動員也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例如，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指出，在中國革命歷程中的歷次運動，都可以發掘到情感工作的影子^①；劉瑜認為毛話語體系使得革命動員中各種情感的動員和利用成為可能^②；李宇指出，無論是話語動員還是利益動員，都離不開情感的積極參與和有效運作^③。從個人視角來看，我們會較多看到政治權力對於個人情感的壓抑和控制。如王英的研究指出，無論誰過份關注個人感情，其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成為「政治不正確」和墮落腐化的罪證，成為「資產階級思想」的表徵^④；李志毓提出，共產革命中最基本的張力關係——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對於革命黨、對於個人，分別意

味着甚麼，是理解中國革命的一個關鍵性問題，而情感史視野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具有獨特意義^⑤。

如何看待國家權力與個人情感之間的關係？是國家單向的高度塑造還是個人有理想的追求或迎合，抑或是國家與個人的雙向塑造？國家權力和國家政治符號對於私人情感有何具體影響，在實際生活中又表現為何種關係？這些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也期待有更多更詳實的資料披露。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 (Brill) 最近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長編」叢書 (*Chronicl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Life*) 第二卷《生活的流水——書信裏的中國人》 (*Personal Letters between Lu Qingsheng and Jiang Zhenyuan, 1961-1986*)，引用只註日期和頁碼)^⑥或許能為上述疑問提供部分解答。

該書收錄了1961至1986年間一對知識份子夫妻陸慶生與江貞媛 (以

* 本文為國家哲社重大課題「當代蘇浙贛黔農村基層檔案資料搜集、整理與出版」(批准號：12&ZD147)的階段性成果。



Letian Zhang and Yunxiang Yan, eds., *Personal Letters between Lu Qingsheng and Jiang Zhenyuan, 1961-1986*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ublishers, 2018).

下簡稱慶生、貞媛)以及親友之間的通信679件,詳細展現了他們的個人思想、情感、生活及其親友關係。信件內容顯示:慶生、貞媛為湖南人,大學畢業後均在北京冶金工業部工作,隸屬不同部門。由於工作需要,慶生常年出差,貞媛也長時間有外派工作,因此兩人從戀愛到結婚,聚少離多,日常聯繫以通信為主。根據所收書信,1961至1986年間,慶生、貞媛通信340多件,以1961至1966年期間尤為頻繁,計270件左右。書信作為慶生、貞媛兩人日常溝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詳細記述了當時中國年輕夫妻對於愛情、婚姻和家庭的認知及其相關問題的處理。

有意思的是,據筆者統計,在兩人書信中「(共產)黨」是一個運用比較頻繁的詞語:「黨」出現78次,其中包括「(共產)黨員」18次,「入黨」16次,「中國共產黨」44次;「組織」這個詞出現了22次,表達共產黨組

織意思的為21次;「同志」出現了83次,可見黨員的身份和符號貫穿他們兩人的感情生活。這些書信為我們真實展現了當時年輕的共產黨(團)員的感情表達方式、情感交流內容,以及國家在個人情感中的印迹,是情感史研究的重要民間資料。本文以1961至1966年間慶生、貞媛書信內容為主,對其間展現的內容和問題進行初步解讀。

一 「共產黨員」:作為感情基石

根據慶生和貞媛的信件,「共產黨員」作為一個符號和身份,在兩人情感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講是兩人感情的基石;追求思想進步、向黨組織靠攏是向初戀之人表達自己值得信賴的重要體現。在慶生和貞媛戀愛期間,貞媛在信中談及學習、工作和政治思想的求上進問題,慶生作為黨員提出三條建議:一是加強政治學習,二是依靠黨的組織,三是建議寫入黨申請書。在政治學習方面,慶生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具體講了學習的方法,講明一定要做一個政治上成熟的人。後面兩條雖然簡單,卻是非常具體,要求貞媛要依靠黨組織、向黨組織靠近(1961年12月5日,頁21)。

慶生和貞媛之間的思想表達和交往帶有明顯的時代痕迹。在最開始的通信中,因為尚未進入熱戀階段,彼此以同志相稱,感情表達尚不熱烈;到了熱戀階段,追求進步、為黨和國家貢獻力量也在信中明確直白地表達出來。如在1961年底給貞媛的一封信,慶生在信首熱情洋溢地寫道:

當你收到我這封信的時候，已經是新的1962年了，我的好同志，最忠摯的永生的伴侶，讓我首先向你祝賀吧！祝賀你在新的一年中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績，祝你在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紅色專家的勞動和創造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我相信你將用自己的努力，加快自己前進的步伐。親愛的好妹妹，當我在瞻望明天的時候，由於把我倆的思想、感情、生活及所有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了，由此所產生的力量，將使我們可以去克服任何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我們將一定能為我們所生活着的時代，供[貢]獻我們的一分力量，只要我們是勤勤懇懇地工作，好好地聽黨的話，老老實實地學習，就不會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這樣，時間和生活的實際將向我承認說：「在為創造比今天更好的明天的鬥爭中……你們並沒有怠工，你們是一名合格的列兵……」如果當我們在將來回顧今天的時候，我們就不會為之慚愧！（1961年12月28日，頁28）

在另一封信中，慶生邀請貞媛到自己家中玩：「星期天到我家裏去吧！我媽媽一定會很好地招待你的，我弟弟也很好，你可以與他多談談，好比入團問題呀！」（1961年6月27至28日，頁7）可見無論是思想表達還是日常交往，追求思想進步是增進彼此關係的第一步。

如果只重點看前述內容摘錄，或許會讓我們得出慶生、貞媛個人感情被極度壓抑的結論。事實上，在很多信件中，慶生在字裏行間都表達了對貞媛濃烈的愛，如：「我最近的幾封信收到了嗎？請你給我來信，你知道，只要你有三四天沒有來信，我心裏就更[格]外地想念了，此刻我是

多麼想看看你喲！」信首稱呼是「最親愛的媛」，信尾落款是「吻你 愛你的忠實的慶生」（1961年12月5日，頁20-21）——在熱戀期間這樣的指稱經常在兩人的書信中出現。從這裏可以看出，慶生和貞媛之間的通信表現出當時中國社會中年輕人正常的戀愛關係和個人感情。

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員）」詞彙的使用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強化真實感情的表達。鑒於兩人的戀愛關係，私人信件中更多地談及感情問題。讓貞媛心有芥蒂的是，雖然到1961年兩人已認識五年多，但中間有一段時間慶生和前女友仍然保持「朋友」關係；兩人的來往信件中幾次提及此事。在一封信中，慶生以共產黨員的名義來表明自己對貞媛是真心的：「但是親愛的同志，你如果認為我虛偽的話，或是發現了我虛偽的行為和事實的時候，你可以撇棄我，我是不會怪你的。因為如果在我的生活中真有這種事情發生，那〈憑〉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良心，我會給我自己沉重的耳光。」「當然在這點上你也應當相信，一個共產黨員的一切是應當完全置於黨組織的監督之下的！我認為我是這樣做的！」（1961年6月22日，頁3）

因為貞媛對此事一直存疑，慶生不得不數次解釋。有意思的是，慶生認為自己在這件事情中是光明正大、問心無愧的，因為自己和前女友的相關情況在其入黨履歷材料中就已承認過。言及此，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共產黨員私人感情被暴露在組織的監督之中。從慶生多次詳細的解釋中可以了解到，慶生確實曾私下認真徵求過黨組織內同志的意見，想要尋找幫助；對於此事，兩位被徵詢者也沒有

向組織匯報。讓他矛盾的是兩位同志給予的意見是有分歧的：一說慶生應該幫助前女友在思想上進步，並繼續保持朋友關係，「既然你們以前就好了，現在你應當幫助她，丟掉人家是不對的」；一說慶生可以放棄思想有落後表現的前女友，「我們不可能設想，一個共產黨員與一個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建立愛情，我們不需要一個只專不仁或不專不仁的人……」（1961年6月27至28日，頁5）慶生不知何者意見為佳，在矛盾中與前女友保持朋友關係達兩年之久。這些表述都談及「共產黨員」的身份，由此可見「共產黨員」作為思想進步的標識，成為愛情是否得以維繫的一個重要評判條件。

在慶生和貞媛通信中，我們也比較多看到類似的表述，如慶生這樣解釋和貞媛戀愛的原因與基礎：

至於我為甚麼要愛你，這很簡單明確：我們共同五年生活在一起，是我們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基礎。我們都相信黨，願意為黨工作，願意在黨的教育下很好地進步（幾年來我們都有很大進步，首先這是黨教育的結果），這是我們的思想基礎。雖然你有缺點，我也有缺點，但這正是我們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的基礎。尤其是你，親愛的江貞媛同志，幾年以來，我深刻地理解到你對生活的認識是正確的，你在思想修養和對待同志方面的很多長處，是值得我學習的。在這方面我多麼需要你的幫助和監督呵！你願意這樣嗎？你應當嚴格要求我，你答應吧！當然我也了解你的缺點，我今後也會嚴格要求你的。在我熟悉和了解的姑娘中，我認為你的心靈是最善良和最純潔的，我衷心地愛你。（1961年6月27至28日，頁6）

雖然上述內容沒有使用「共產黨員」這一名詞，但字裏行間很明顯是指涉共產黨員的責任：彼此相信黨，願意為黨工作，並能夠在黨的教育下進步，被列為兩人戀愛的思想基礎。信中讚美貞媛的品格，用了兩個不同指向的「同志」，表述的仍是基於崇高思想的愛情追求。我們會發現，愛情通常要與同志式的友誼相同，否則就被視為不純潔、不當的。

慶生和貞媛的往來信件對愛情觀進行了非常豐富的表達，尤其是在慶生的表述中，充分體現了對於愛情的追求。一方面，我們會看到同志式的愛情、同志式的友誼。如慶生對於自己的評價，是基於同志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與貞媛之間的戀愛關係也是同志式的友誼關係：「所以我感到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應當容納一種重要的客觀的尺度。更虛心地從同志式的友誼中獲得幫助，從你的鼓勵和幫助中獲得力量。親愛的同志，請你相信我，我會這樣的，因為我從內心確實意識到自己的缺點，對自己的進步和對組織確實造成過損失。」「有位詩人曾經說過：『愛情只是幸福生活的大花籃[籃]中的一朵藍色小花』。雖然它是美好的，但它只是人生寬廣豐富的生活內容的一個方面。當然它是重要的一個方面。一個正確理解了它的人，只會從愛情的幸福中獲得鼓舞和力量……你說是嗎？我想我倆都會這樣的。否則它是沒有意義的。」（1961年6月27至28日，頁4）

另一方面，慶生在信中也表達了自己對貞媛的愛是同志式的友誼不能涵蓋的：「你說過愛情的主要內容就是成為『鼓舞和力量』，我們希望都是這樣。好〔貞〕媛，我完全地知道，你是那樣衷心地愛我，愛情的光輝照亮

了我們的生活，遙遠的距離，隔不開我們心心相印的命運。」(1961年12月8日，頁23)在信中我們也看到慶生對於正確的愛情和錯誤的愛情的表述，一再強調這些享受的愛情都是短暫的，也是「錯誤」的愛情。表面上看，他對資產階級的愛情進行了批評，對工人階級的愛情進行了正確的宣揚。不過，如前所述，慶生的表述是有前提的，是為了向貞媛解釋自己與前女友的交情；對此，我們也可以看作是慶生為了表述和貞媛之間的愛情更為可靠，以消除貞媛的疑心和不滿。

1961至1962年，慶生和貞媛的書信內容比較多地展現了年輕人對愛情的熱情表達，其中，「共產黨(員)」、「共產黨組織」都是積極向上的表徵。當時在許多文藝作品中，「愛情，在優秀革命工作者眼中，僅是工作需要；二人結合，並非肉體苟合，而是精神的投契、魂靈的統一，迹近未受污染的柏拉圖式愛欲」^⑦。主流的宣傳有其主流意識導向的必要，但在具體的私人感情領域，政治符號不僅僅代表年輕人的革命激情，而是變成了強化個人感情的基礎。慶生和貞媛的信件是個人感情的真正表達，兩人(尤其是慶生)對於愛情的表述不可能是禁欲的。政治符號的出現並不能完全代表政治化的感情，當中極具私人性的感情表達也是真實存在的。

二 「共產黨員」：作為行為模範

「樹典型」是中國共產黨延伸政治權力和宣揚政治文化的一種重要的方式，不僅能夠有效地將政治權威的意識形態灌輸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去，還能協助政治權力的延伸^⑧。「共產黨員」被國家樹立為一個高大的形象，成為各行各業人們的行為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虛指，而是廣泛應用於工作和生活當中，在慶生和貞媛的通信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標準在夫妻感情中的重要作用。

前述慶生和前女友的關係問題，慶生不知兩位黨組織同志的意見何者為佳，在矛盾中與前女友保持朋友關係達兩年之久。事實上，兩人的表述都言明追求進步、政治可靠是一名共產黨員維繫戀愛關係的重要條件。婚後，貞媛對慶生和前女友以及大學同班同學孔維帆的關係還是有疑心，慶生鄭重以「共產黨員」的品格來表明心迹：「在我思想上，我一定用誠懇的態度，贖罪的決心，以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道德品質來對你——我的心愛妻子，共青團員，把這一些問題嚴肅地談一談。我的態度和出發點就是這樣，我們都是無神論者，賭咒發誓是沒有意義的！」在慶生看來，日常生活的方向也應和黨、國家保持一致：「我希望和睦的家庭幸福的生活使我們共同進步，好好工作，不辜負黨和國家的信任、教導和培養……」(1963年下半年，頁40、43)慶生認為夫妻之間共同努力，響應國家號召，是共產黨員和團員的責任，在給貞媛的信中，慶生滿懷激情地說：「不去想我的過去吧！原諒我這有罪的人吧！讓我們共同來創造我們共同的健康思想，把全部精力付之於政治和工作進步吧！我們一定要也只能是在我們別後的一年開始更美好的生活吧！在這大學、大趕、大比、大幫之年^⑨，在我經過這一年的勞動鍛鍊之後，改變現有狀況吧！這應當作我們黨團員的責任。」(1964年4月15日，頁49)

現實生活中的困難無疑與理想有相當大的矛盾，對此慶生也是用革命前輩的事跡來激勵自己、鼓勵妻子：「我在千里之外，對你和孩子牽掛之甚，是超過一切人的。但我知道決不能因此影響勞動鍛練，當我想到多少革命前輩別下妻兒投身革命鬥爭（這決不能說他們無情，也不能說他們毫無思念之情），他們為大我，暫時犧牲小我，而何況我們目前的狀況與他們的情況不可論比呢？所以我也希望你以工作、業務、政治進步為重，擺開或盡量減少牽掛，把主要精力集中起來，使今年在政治業務、身體健康方面打一點基礎。集中精力搞點基本建設。」（1964年4月15日，頁49）

慶生和貞媛非常看重「共產黨員」在日常生活中的示範作用，尤其是對於貞媛來講，自己只是個團員而不是黨員，但慶生卻是共產黨員，因此在信中也往往用共產黨員的品格要求來批評慶生的缺點和不足：「你說你現在個性強，脾氣躁，這是不好的，這何以只是你現在的毛病哩？從大學到家庭，直到現在都是如此，你為甚麼要在同志面前脾氣不好呢？我認為你應好好從頭檢查一下原因，我們不能因為個人的情緒而影響工作及影響自己的黨性和修養。」（1965年1月19日，頁248）從信件內容可以看出，貞媛對慶生有着很高的期望和要求，因而直言慶生無論在思想上、業務上，抑或群眾關係等方面都要有好的表現：「希望你好好勞動，鍛練和提高自己，群眾關係、同志關係一定要搞好，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自高自大，不虛心學習，自己不是要說成是，這是前進中多大的敵人啊！……另外我還認為，你應該抓緊時間學習，不論是業務還是政治理論。」（1964年4月20日，頁216）

針對慶生的缺點，貞媛也用鼓勵的方式希望慶生能表現更好，以紅軍長征為例子來勉勵慶生，並提出要經常學習，提高修養：「我回憶了一下你以前下農林插秧、雙搶^②的情況，印象不太深，我希望你時刻嚴格要求自己，想過去的苦日子，想想二萬五千里長征，一定要艱苦奮鬥，要做得比別人好，帶頭苦幹，帶頭吃苦，而在生活福利方面多給方便給別人，一定要隨時救場〔幫助他人〕，不要自私，儘管每天吃不飽，也要多顧及別人，你懂我的意思嗎？……嚴格要求自己，不知你平常看了甚麼書沒有，要能帶上一套毛選或青年修養方面的書在身邊就好了，可是我買不到，也無法向你寄來。」（1964年5月1日，頁219）

當然，對於貞媛所給的建議和批評，慶生同樣認為在原則上來講，自己有着共產黨員的責任感：「當然你經常地寫我甚麼沒志氣、懦弱等，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在政治業務進步方面是會很好處理的，我並沒有缺乏政治靈魂，缺乏生活的原則性。不論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不會只憑個性（那你憑甚麼打我）對待問題，還是一句老話『誰願意保持目前的家庭狀況的局面，那才是真正的怯懦呢！』為此我一定向你再三的提高呼籲，為此呼籲我們共同都拿出生活的原則性來，也要拿出我們黨團員的責任感來。」（1964年4月27日，頁52）

學界研究認為，1949年後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因為模糊了性別差異的敘事而造成了欲望的懸置，在革命經典敘事形態中，任何個人私欲都是可恥而不潔的^③。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現實生活與文藝宣傳似乎達成了一致。「共產黨員」作為一個政治符號，在夫妻感情

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成為衡量雙方日常行為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我們不能做如此簡單粗糙的分析和評價。事實上，感情和生活並不能被政治代替，政治也不能完全解決慶生和貞媛兩人的感情和生活問題。李海燕認為愛情話語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和社會想像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歷史、政治和文化的融合使得「愛」具有塑造生活和自我認同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塑造一個以文明為導向的公共領域^②。根據慶生和貞媛的書信，我們看到「共產黨員」和「愛」同樣被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這不僅僅是政治力量的體現，更是融合了政治、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因素，是生活和社會複雜性的體現。

三 「共產黨員」：解放觀念還是解放情感？

信件內容顯示，慶生和貞媛曾經為同學多年，彼此之間是熟悉的，但未必有非常細緻深入的了解。戀愛期間和婚後兩人長期處於分居狀態，彼此溝通也非常有限。前述以「共產黨員」為中心的思想基礎和行為規範使他們走向了婚姻，但並不意味着彼此可以和諧生活。戀愛時通信中有較多的甜言蜜語，而婚後一些問題和矛盾湧現，在信中也有明顯的體現。在這些矛盾的交織和處理中，「共產黨員」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符號，但它是否能夠讓個人情感獲得解放呢？慶生和貞媛的信件給我們展現了更現實、更複雜的內容。

第一，關於愛情、婚姻的認識和觀點。由於思想和生活的一些矛盾，

慶生和貞媛在信件中非常嚴肅地談到對婚姻的認識和態度。慶生和貞媛的愛情觀和婚姻觀是不一致的，在生活和交流中這種分歧愈來愈明顯，甚至產生了巨大的矛盾。對此慶生在信中有長篇論述：

婚後我認為我們是抱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態度的。我是高興自慰，心滿意足自己的妻子和愛情，我並沒忘記自己的諾言和決心。我希望和睦的家庭幸福的生活使我們共同進步，好好工作，不辜負黨和國家的信任、教導和培養……而你呢，我認為你期望是有的，但是對愛情等許多東西，你開始就抱懷疑態度，你好像開始就抱着一種臨時的想法，沒有共同生活一輩子的態度和決心。你待我至少也還是抱着一種考查等着瞧的態度。如果說在我們建立感情之初，「你以同樣的愛來回答我的愛情」，但在婚後你並不是這樣。事實也是這樣的，如你稍有一點不順心的事，就隨時離開家，有時甚至是深更半夜。這在你生孩子以前，就不下十好幾次。(1963年下半年，頁43)

慶生認為自己對愛情和婚姻是抱有極大的希望和信心的，他使用了富時代性的說法——「共同進步，好好工作，不辜負黨和國家的信任、教導和培養」，以表示自己對愛情和婚姻的極大信心。但因為貞媛對慶生的懷疑、對孩子的恥辱感^③等事情，顯然與慶生的期望形成鮮明對比。慶生最終雖然表達了自己會做檢討的態度，但從他對貞媛的指責、對自己的痛苦描述可見，這顯然已不是單方面錯誤的事情，彼此之間的裂痕已然加深。對貞媛而言，慶生的言行直接傷

害了她，也對婚姻有非常不好的影響：對貞媛不尊重，甚至歧視；在貞媛生孩子後坐月子期間，慶生沒有好好對待和照顧貞媛；尤其是當着慶生母親的面動手打貞媛。這對貞媛造成非常大的傷害，甚至在一封信裏紀念「打我一周年紀念日」（1964年7月4日，頁233）。

第二，關於政治思想問題。在溝通過程中，慶生認為貞媛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問題。在收到貞媛的「打我一周年紀念日」信件不久，慶生專門對貞媛提出一些意見和要求，概括為政治思想、工作和學習、生活和其他三個方面，並在政治思想方面做了詳細的分析：

從大學的後兩年，到工作崗位的近三年來，政治思想上轉變較大，立場、觀點上從反右以後是明確多了，擔任團的工作中，依靠組織，工作主動，關心同志。我側面徵求過陸述賢的看法，他說「在政治思想和工作方面，在同志們和領導的印象上都挺好。」各方面都幹的不錯，從這一反映和我自己的觀察，我是放心和滿意的，但是我認為嚴格要求，尚在不足：(1) 你是超齡團員了，怎麼辦呢？以革命者的態度來要求，應當積極要求入黨。難道你在政治上的最後歸宿就是入團——超齡——退團嗎？嚴格說起來，這是政治生命的死去（對革命者來說），沒有理由不積極爭取入黨，當然入黨不是人人都能的，如果人人可入黨，那黨也無意義了。而對你我認為必須是嚴格要求。(2) 你的父親是過去作「買賣」的，現在還拿「定息」的人，思想上必須正確認識，應當「感情」是「感情」，立場是立場，應有界線（我過去對待你沒多談這件事，我擔心你會誤會我），(3) 你在

政治思想認識上覺悟上應經常注意提高，人一定要有政治遠見性，我想我們要建成社會主義達到共產主義，這個時期中的階級鬥爭等，扶植新生的社會主義的東西（思想意識），改造舊的東西，革舊東西的命，現在將來都將反映在自己的家庭、親人、親戚、朋友……之間，這些東西有的人會不注意，嗅覺不靈敏，察覺不到，有的人是可以自覺革命的。在政治上我認為你還不是積極熱情的，政治遠見性不夠。（1964年7月22日，頁66）

從慶生鄭重其事的表述來看，他高度重視政治思想，認為他和貞媛都要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甚至認為階級鬥爭也要在親朋好友的家庭間進行。

第三，關於對家庭的看法。在書信來往中，慶生和貞媛彼此都有檢討，但對對方的批評也一直沒有停止。從慶生和貞媛的爭執中，我們要思考其時的婦女與家庭關係。從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對婦女的特殊壓迫主要是由她們在家庭內的傳統地位造成的——不許婦女參與「社會」生產，使她們陷入家庭這一「私人」領域的家務勞動之中^④。家務、家庭關係成為慶生和貞媛感情矛盾的主要問題，兩者感情的衝突卻直接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改造」、「革命」等政治性詞彙來表述。到1966年，當慶生承認自己的人生觀有嚴重問題時（1966年6月18日，頁110），這正正成了貞媛批評慶生的把柄，貞媛用充滿鬥爭味道的語言從政治思想高度嚴厲批評慶生的思想：

既然你知道你的人生觀有問題，為甚麼不好好改造自己，直到現在還說出這種話來？我害臊甚麼？你

才不知害臊哩。作為一個黨員，大概運動中也很「積極」吧？可是你自己腦子裏這一套，能夠得上嗎？你是無產階級事業第一還是「愛情」至上？你既然承認自己在這方面有缺點，而又千方百計為自己辯解，又是為甚麼？一個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不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老自以為「是」，這樣發展下去，當了「官」敬了「財」就會變質，你不止一次的想過要和我同歸於盡，如果這樣，你會遺臭萬年！有這種想法就是嚴重的資產階級人生觀，不配〔做〕一個共產黨員，你以為我會害怕嗎，我不是那種膽小鬼！我只是因為沒真認識你而感到非常痛心，對這些問題，你必須好好認識和改造自己，生活問題不是小問題，也不能孤立起來看。……

關於入黨你經常跟我談這個問題，可是目的何在，你並沒有很好的談過，只是說明了，要發展……

而我的想法是，自己不夠，特別是對於我的生活，我對你有這麼多意見，就免不了要「吵架」，而我認為作為一個黨員，怎麼能不首先在家庭這個問題上解決好問題呢？特別如果我入了黨，兩個黨員組建的家庭，那應該是個好〔榜〕樣的，可是正如我上面所說的，我們之間這些「矛盾」還沒有基本解決。（1966年6月26日，頁262-63）

貞媛從共產黨員的標準出發討論家庭應該是甚麼，其語言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若沒有後面一段，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那是同志間或者不同階級間的鬥爭與批評。貞媛在數次通信中，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對慶生進行批評。當然，箇中的原因不僅僅是慶生認為自己符合標準而貞媛認為其

不合標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雙方對家庭和工作的態度和精力投入是不一致的。慶生和貞媛長期分居，最初照顧孩子和家庭的責任都落到貞媛的身上，即使兩人在一起，慶生也沒有積極承擔家庭責任的表現，並因為多次無端指責貞媛導致矛盾一次次升級。

第四，關於愛情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把慶生和貞媛的信進行對比，可見貞媛不像慶生最初那般表現出濃烈的愛，慶生也多次講過貞媛從未直接表達出愛慶生。婚後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後，貞媛在信中也更多地表達對慶生的不滿。根據上述內容，我們很容易得出貞媛的愛情是純粹的政治性愛情的觀點。但是貞媛在「打我一周年紀念日」的信中明確闡述了愛情與政治的關係：「愛情要以政治思想為基礎，但政治不能代替愛情、黨團員的責任！如果你真的懂得這個責任，就不至於像今天這種結局。」（1964年7月4日，頁232）由此可以看出，貞媛認為愛情要以政治思想為基礎，同時不能因為這個基礎而忽略了工作上的進步、家庭的和諧，否則就不是一個合格的黨團員。愛情與政治兩者關係雖然密切，但不是相互取代關係。對於這點，慶生也幾次坦言自己及其母親都有封建思想，並檢討自己的思想和態度：「沒有及時地消除隔閡，在專權封建殘餘思想的支配下，我覺得我是你的丈夫，我有權全部地佔有你的全部愛情，因此有時似乎粗暴地片面地向你強制索取……後來我雖然完全理解到有許多事情是你性格心情上的問題，但我沒有幫你解除，反而責備你是『世俗觀點』像『普通家庭婦女』那樣，這種錯誤的態度，也加深了事情的矛盾。」（1965年8月5日，頁99）

在戀愛和結婚初期，慶生和貞媛較少用階級來界定感情。最早的一次是1964年5月慶生檢討自己的錯誤：「首要的是我的誠心誠意檢討認錯，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你也可以幫我挖根子。我自己挖出來些甚麼呢？主要是資產階級思想作風。」（1964年5月6至7日，頁54）隨着慶生和貞媛兩人矛盾激化，此後的通信中也比較多地出現用階級評定個人思想和行為，無疑這有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但也暴露出一些深層次問題。情感解放與觀念解放是有差異的，正如杭蘇紅的研究指出，民國新女性的情感經歷雖然表面上是一個不斷尋求情感解放的過程，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它也是一個不斷進入情感、擺脫情感、再進入情感的往復過程^⑤。在慶生和貞媛的情感生活中，「共產黨員」作為政治符號是感情基礎和行為標準。當落實到具體感情和生活時，這個政治符號必須與具體的思想和行為表現相一致，當出現過大的落差時，慶生貞媛之間爆發矛盾；落差愈大，矛盾愈突出；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承受了莫大的苦悶和痛苦。總而言之，「共產黨員」作為一個政治符號被國家高度宣揚，必然也會對個人思想和情感產生重大影響，以至於慶生和貞媛視之為解決個人感情和生活問題的重要符號。

四 結語

綜上所述，慶生和貞媛的信件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1960年代中國年輕人的感情和婚姻生活，對於相關問題的敘述非常詳細，對於我們認識這一時期共產黨的情感動員有重要

的史料價值。慶生和貞媛的信件較多討論了愛情觀的問題，由此可作為建國後城市男女愛情觀和婚姻觀的一個展示。1950年新中國頒布實施建國後第一部《婚姻法》，廢除了以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為特徵的封建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確立了新的婚姻制度，強調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這一國家政策對婚姻和家庭的影響有其實際意義，但並不意味着人們的婚姻狀態就此可以與國家政策相一致，慶生和貞媛的信件給我們展示了其時中國社會中一種更生活化、更真實的感情和婚姻狀態。

論者指出，政治符號深深扎根於社會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不僅會形成政治認同，也會改變人們的認知與思維方式^⑥。學界關注的私域政治化問題，在慶生和貞媛的信件中也有非常明顯的體現，但不僅僅是感情政治化的表現，還有個人對於政治符號的有意識運用。為了擺脫家庭的束縛和不合理的對待，貞媛借助了強有力的政治符號——「共產黨員」，對丈夫進行了批評，以爭取家庭內部的平等權。信件內容不僅給我們展示了個人感情的表達，也突出體現了時代印迹——「共產黨員」這個政治符號在個人情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符號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影響是具體而深刻的，在個人情感中是一柄雙刃劍。女性思想解放的過程承載着諸多痛苦、苦悶的情感，這種感受不僅僅由女性承受，與之相處的男性也會受影響。慶生和貞媛的書信往來不僅披露了貞媛作為女性尋求家庭平等的努力和痛苦，還詳細展示了慶生作為男性面對感情紛爭和家庭矛盾的思想和表現。誠如賀蕭（Gail Hershatter）

所提示，將性別研究與其他問題隔離開來是非常不智的事情^⑩；慶生和貞媛的信件還有教育觀念、醫療觀念等其他內容的展示，筆者認為可以將性別研究與其他問題相結合，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註釋

①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頁97-121。

② Yu Liu, "Maoist Discours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36, no. 3 (2010): 329-62.

③ 李宇：〈中國革命中的情感動員——以1946-1948年北方土改中的「訴苦」與「翻身」為中心〉（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④ 王英：〈大公無私：新中國革命改造中的愛情與家庭〉，《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2年10月號，頁44-55。

⑤ 李志毓：〈情感史視野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研究〉，《史學月刊》，2018年第4期，頁14-17。

⑥ Letian Zhang and Yunxiang Yan, eds., *Personal Letters between Lu Qingsheng and Jiang Zhenyuan, 1961-1986*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ublishers, 2018).

⑦ 謝宏聲：〈革命電影的愛情與政治〉，《電影評介》（貴陽），2013年第23、24期合刊，頁13。

⑧ 馮仕政：〈典型：一個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學海》，2003年第3期，頁124-28。

⑨ 人民公社時期，將經濟建設上的競賽如勞動競賽或生產競賽稱為「比學趕」、「比學趕幫」或「比學趕幫超」。五年經濟調整時期，「比學趕幫超」運動進入黃金時期。1964年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把「比學趕幫」運動作為在經濟建設中開展群眾運動取得的成功經驗之一，「比學趕幫超」發展到高潮，得

到廣泛宣傳和運用。具體研究可參見吳志軍：〈1949-1966：「比學趕幫超」運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21。

⑩ 人民公社時期，為了增加糧食的產出，政府號召農民一年種三熟，一熟春花，兩熟水稻。三熟制大大縮短了每一熟作物的生長時間，各熟之間必須精心安排，早稻收割、晚稻插秧時間最為緊張，搶收搶種才能不耽誤農時，因而稱之為「雙搶」。

⑪ 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39。

⑫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9.

⑬ 在同一封信中，慶生敘及，貞媛說過，由於父親慶生品行不良，她為兒子感到恥辱。

⑭ 賈格爾 (Alison M. Jaggar) 著，王昌濱譯：〈婦女解放的政治哲學〉，載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281-300。

⑮ 杭蘇紅：〈「觀念解放」還是「情感解放」？——民初湖南新女性「離家」的實踐困境〉，《婦女研究論叢》，2016年第1期，頁65-70。

⑯ 相關研究參見村田忠禧：〈從《人民日報》元旦社論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3期，頁78-84；陳蘊西：〈合法性與「孫中山」政治象徵符號的建構〉，《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頁170-76；羅曉翔：〈「金陵根本重地」——明末政治語境中的風水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3期，頁22-29，等等。

⑰ Gail Hershatter,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10.